

开学季,知名学者回忆——

那些年难忘的大学时光

时下,随着 2021 年新生报到工作陆续结束,各高校的校园中又多了一批新鲜的面孔。在陌生的校园里,他们不免要面对这样一个“灵魂之问”——未来,我的大学时光该如何度过?

为此,《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特邀请郭光灿院士、陈平原教授等高校知名学者,回忆他们多年以前的大学时光,记录下那些至今令他们难以忘怀的人和事。这些回忆中,有学者们沉淀多年的思考,也蕴含着他们对年轻学子的期许,希望能够给莘莘学子和青年学者们一些启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郭光灿:

我在中国科大的量子“第一课”

我是在 1960 年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别看那时中国科大才刚刚成立两年,但它在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心目中地位极高。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它所倡导的育人宗旨是“红专并进”,旨在培养又红又专的尖端科技人才。“理工男”的理想和浪漫交融在一起,就是中国科大。

中国科大的本科生学习年限是 5 年,当时全国另一所五年制的高校是清华大学。1959 年 5 月,中国科大就已经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15 所高校一起,被列为全国 16 所重点大学之一。

一切都很好,只有当时的年月不太好——“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大家好像永远都吃不饱;北京的冬天特别冷,从福建来的我开始很不适应。

尽管生活上颇为窘迫,但大家在学习上非常努力,十分珍惜这一宝贵的学习机会和良好的学习环境。

中国科大成立时,最初想请苏联专家前来授课,但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科学院决定由院属研究所的科学家大师们亲自授课,所以在建校初

期,中科院每年到校授课的科研人员多达 300 人次。马大猷、贝时璋、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柳大纲、赵九章、赵忠尧等一批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纷纷亲自登台授课。

著名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大校长严济慈亲自给我们上过课。严老同时给 8 个系超过 500 名学生讲授电磁学和电动力学。他每周授课 3 次,连续讲授了 6 年,每次都有很多外校学生慕名来“蹭课”。

至今我还记得严老经常跟我们说:“我希望培养你们成为一把锋利的刀,有着解开各种难题的能力。”

1963 年升入大三,这一年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平生第一次接触到“量子力学”这个贯穿我整个研究生涯的概念。

大学期间,几乎所有同学对我在学习上的印象都是“认真刻苦”“成绩优异”,因为学习成绩比较好,我成为系学生会中两个学习委员中的一个。认真刻苦归认真刻苦,其实我们的学习还是相对轻松的,几乎没有什么特别不理解或需要反复琢磨才能明白的知识概念。在师长、同学们眼中,我可能就是块“学习的料”。

然而,量子力学却是一个例外。

大三这年,学校为我们正式开设了“量子力学”课程。这是一门算学分的必修课,学时是一学期 90 学时,任课老师是我国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奠基人之一张稼钊先生。张先生刚刚从教不久,因为当时还十分年轻的他长着一张娃娃脸,所以我们在私下里都称他为“小量子”。

也可能是因为量子力学实在太过玄虚,也可能是当时尚有些年轻的张老师执教经验不足,总之我们几乎完全听不懂。

其实张稼钊先生也算特别尽力了,他还经常打一些通俗的比方来解释那些艰深的概念。比如,他在描述不确定的量子态时曾比喻:“鲤鱼吃过吧?鲫鱼吃过吧?两种鱼都吃过吧?现在这道菜两种鱼的味道都有,这就像是量子状态。”

只是,张老师不打比方还好,打了比方我们反而越发听糊涂了。

总之,很多同学最终还是不理解量子力学这门课究竟在讲些什么,甚至根本不理解量子力学究竟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们中的有些人生活剥地掌握了一

定的解题技巧,但涉及量子力学的真正概念与内涵,大家还是感觉云山雾罩,不知所云。

最要命的是这门课的结业考试。考试的时候,几乎所有同学都如临大敌,我当时也全无把握。记得当时是上午 8:00 开始考试,直到中午 12:00 还没有考完,因为很多同学都做不出那些题目,自然也交不出答卷。眼看到了午饭时间,老师破天荒地允许大家先去食堂吃饭,吃完回来下午继续考试。

大家也很守规矩,午饭期间也没人交流讨论,只是心情都十分不好,食不甘味、味同嚼蜡。

印象里我是在上午就交卷的,没有在饭后“返工”。意外的是,那次考试我得了满分 5 分。要知道,这次考试过关的同学凤毛麟角,有一半的同学不及格。

但现在想想看,那时候我也只是掌握了做题技巧,并没有真的学通弄懂。然而,越是弄不明白,我越是感到好奇,越是想要搞清楚。尽管再次与量子力学结缘已经是十多年后,但可能从那时起,量子力学就在我心里播下了种子,毕竟那是我的量子“第一课”。(本报记者赵广立采访整理)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

大学家书中的『陈年往事』

写下题目,当即自我解构:到底想写小说、散文还是回忆录?40 多年前的陈年往事,你还记得清楚吗?记忆力本就不佳,加上“天增岁月人增寿”,更是江河日下。当年没写日记,凭什么敢这么答题?记得钱锺书有一妙语:“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生怕被钱老在天之灵嘲笑,忆旧时我总是小心翼翼,不敢随便发挥,依稀记得的,须找到佐证才敢下笔。

真是天助我也!前年夏天回潮州,母亲交给我一包东西,那是我出外念书期间寄回来的家书,父亲装订成册,上面还有不少圈点。最早一封写于 1978 年 3 月 11 日,正是我进入中山大学校园的第二天,主要内容是报平安。最晚一封则是 1989 年 10 月 30 日,信中提及刚写完一篇谈武侠小说的文章。

我是七七级大学生。1978 年 3 月 10 日清晨,我从潮州乘长途汽车,傍晚到达广州,入住康乐园的中山大学学生宿舍。第二天报到、体检、领餐券,紧接着好几天入学教育,再就是三周的军训,真正上课已经到了

四月中旬。翻阅家信,3 月 10 日报中文系四年总的课程安排,包括“第三年下半年专业化,第四年写毕业论文”;4 月 4 日报系里生活补助,班里有十几位带薪上学,还有两位家境很好的主动放弃,其余的按家庭收入确定补助金额,我因如实申报,得到了最低档每月四元;到了 4 月 26 日家信,方才正式介绍上课情形:“我们的功课是上午上课(2~4 节),下午泡图

书馆或自学,晚上也自学。星期四下午、星期五晚上开会,星期六(单周)下午劳动。图书馆学习环境好,我常去,不过得‘抢’位。报纸也常看,每个宿舍一份,或‘南方’,或‘人民’,或‘光明’,轮流看。同学学习很认真,吃过晚饭不休息,继续念书。我和(吴)承学坚持每天晚饭后散步,因怕身体累垮。我想,要提高学习效率,不要延长学习时间。”

信上没说到底上的是哪些课。好在几年前我为了撰写《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曾从中大复印了学籍卡及课程表,因此可以很笃定地“昭告天下”:我第一学年的课程包括“写作”“中国现代文学”“文学概论”“现代汉语”“英语”“政治经济学”“体育”等,七门课的修业时限均为两学期。可惜学籍卡上只记每门功课成绩,而被我寄予厚望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七级一学期开设课程表》,包含学习人数、考核方式、教学时数以及任课教师,就是没有每周上课的具体时间。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课程表经过再三调整,半年后才上轨道。手头的第二学期课程表写得清清楚楚:周一上午一二节写作课,三四节英语课。就因这最初的仓促上阵,导致我至今无法确定哪个是我就读中山大学中文系的“第一课”。

大凡从小地方来的,刚进大学时都有点胆怯。同宿舍以及同班级的同学好像都很厉害的样子。相形之下,我自惭形秽。刚开始的几周,同学聊天时互相试探,大都倾向于高估对方而贬抑自己。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知识底子太薄,不免有点着急。加上十年“文革”,大家多有耽搁,而那时的口号又是“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几乎所有同学一入学就不分昼夜地拼命读书,似乎想一口吃成大胖子。如此用力过度,弄得校方很着急,下令十二点后学生宿舍统一熄灯,只保留浴室和厕所。大概正是有感于此,才有我信上说的,“要提高学习效率,不要延长学习时间”。

至于图书馆抢位,那是一个全国性现象。一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大学图书馆设施严重不足,始终是个难题。其实,这跟学生宿舍过分拥挤有直接关系。我在中大念书时,十二平方米的宿舍住了七个人,好在大家互相体贴,没闹大矛盾。如今的大学校园,学生住宿条件已大为改善,加上电子设备以及网络使用方便,不再有清晨图书馆前排长队的现象——复习考试期间除外。



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方喻:

我的大学“老先生”

粉碎“四人帮”不久,党和国家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大量派遣留学生、建立我国自己的学位制度,一代一代学子也因之改变了命运,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考取的学校是陕西师范大学,攻读化学教育专业。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我们可能是通过正式考试进入大学的新生中,基础最薄弱的一届。至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们的系主任是已故多年的高鹏教授。高先生也是我大学期间近距离接触过的一位难得的学者,他的两个特点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一是思想开明,思维前瞻;二是平易近人,从不摆谱。

说他开明前瞻,一个事例足以说明。据我所知,“文革”结束后,学校的化学系迎来了第一批引进人才。现在仍健在的章竹君教授、张进胜教授、胡炎荣教授,以及已故的张光教授、钱博教授等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时期引进的。正是这一拨人和化学系原有的师资队伍,共同支撑了化学学科此后几十年的发展。要知道,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普遍僵化、保守的环境下,能广纳贤才是多么地了不起呀!

至于说他平易近人、不摆谱也有事实作证。我上大学时,高先生已经是一位很有威望的老学者。在学生心目中,与他聊天、谈话几近奢望。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几位同学碰到了要步行回家的高先生,没想到他竟与我们同行,一路聊了起来,并给我们讲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告诫我们在专业上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在学好专业课程的同时,在英语或数学上舍得下功夫,否则就会走不远。现在看来,依然很有道理。

正是受这次谈话的启发,我在毕业留校后,毫不犹豫地去学了物理系,和本科生一起学习物理专业的数学、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并参加了相关考试。早期的这些努力,为个人后来跨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被称作“网红”教授的章竹君先生是我入

学后接触最多、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之一。业界的人都知道,章先生是一位思想极为活跃、语言天赋极高、个性色彩极为鲜明的难得人才。校内只要有他的报告,会场几乎没有不爆满的。有人开玩笑,只要章先生一开讲,就是学中文的也要改学化学了。

我上大学时,章先生开设了大概是恢复高考制度后,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的第一门选修课——“仪器分析”。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仪器分析课安排在化学生物楼三层北侧中间的一间教室,每到上课时都有校外人员早早赶来旁听,成为我们上大学时的一道亮丽风景。

张光教授也是一位不能不让人怀念的优秀学者。张先生治学严谨、为人谦和、敬业尽责。有幸的是,我所在班级的分析化学课程由张先生主讲。他对所讲授知识之熟悉、理解之深刻让我这个向来自我感觉良好、很少服气别人的人也为之折服。可以说,跟张先生学习让我终身受益。

说到张先生,就不能不讲他的研究工作。我校当时的化学学科科学研究还很不普及,张先生与胡炎荣教授组成的光度分析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科研小组之一。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科研活动依然历历在目。

记得每每下课后,张先生就会直奔实验室。他们的实验室在一层,没有通风设备。每到偶氮试剂合成时,楼内就会黄烟滚滚,刺激性气味到处弥漫。放到现在,这样的实验室是一定要关门的。这足见张先生和其团队对研究的执着。

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和人开玩笑说,化学有助于长寿,因为当年的污染似乎并没有怎么影响二位先生。张先生享年超过 90 岁,胡炎荣教授也已年近鲐背。我的硕士导师孙作民教授已经 92 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我极为敬重的吴祺教授今年已 95 岁,还在使用微信。

我们的大学四年十分幸运,老师们用心、同学们用力。在帮助学生成长上,老师们从不吝啬自己的时间。借此机会,我再次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1997 年秋,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学者王一川教授攻读文艺美学硕士学位。这是我人生发生重大改变的時刻,王老师塑造了我的未来,塑造了我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和理解文学的思想视野。而如果说这种塑造有一个起点的话,那就是在王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文艺美学专题》上,我俩之间的一番对话。

那堂课上,王老师讲述了古希腊美学的肃穆和崇高。在讲演完毕后,他让我们就这一话题各自发表看法。从上学时候起,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在课堂上发言的学生,那节课同样如此,老师话音未落,我就已经举手了。发言中,我根据自己研读较多的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谈了我对古希腊美学的认知——

现在想来,那时之所以要踊跃发言,“卖弄学问”的心理动机应该是很大的。

然而,让我觉得有点失望的是,听到我的观点,王老师只是点头,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回应。但等到课间,他却径直走到我的课桌前面,我赶紧站起。随后,王老师对我说了影响我至今的一句话:“你得换换脑壳了。”

见我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王老师解释说,你不能只读黑格尔,你要换一些当代的思想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的经典作品。随后,他就提到了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马尔库塞……事实上,我此后在整个硕士和博士期间精读的 44 本理论著作,也是我终生受益的一批精读书目,其中绝大部分作品都在王老师当时所列出的书单中。

这件事情过后,我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直到现在,我都会把这个道理讲给我的学生,那就是你一定要跟从老师的思想读书,因为他就是你的导师。你可以对整个人类文化或者经典的思想家感兴趣,但在学习期间,你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老师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他读了哪些书后,才成为今天的样子?你应该先读一读影响老师的那些经典著作,我把它称为“通过导师寻找大师”。

在那堂课过后,我开始找新书、换脑壳的“工程”,并陆陆续续形成了自己的阅读领域。那时王老师工作很忙,电话沟通是我们交流的主要方式,如果在学校中“抓住”老师,老师常喜欢利用走路的时间聊聊。我们走在北师大南门老行政楼到餐厅的路上,树影斑驳,聊东聊西。说到我的书单,老师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不要以为读书读多了就有学问,读书只有读对了才会真的有收获。”这句话让当时的我非常震撼。正是从这句话出发,我总结出直到现在我都在遵循,同时也要求我的学生遵循的读书原则——少读书,多看书,滥翻书。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观点有些奇怪,毕竟老师通常都是希望学生多读书,为什么我会要求学生“少读书”?这是因为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养育思想和观点的核心书目不应该太多。一个人能够掌握一到两家思想派别的主要观点,并在每家思想派别中,真正读懂两到三本书就非常好了。如此算来,一个人一生值得自己反复阅读的书,也只有七八本而已。

现在很多学者,尤其青年学者读了好多书,做了好多学问,但往往只会说人家的话,无法形成独立看待世界和理解问题的“独断”——读书读多了,自己就没有了立场和视野,自身观点也容易混乱,觉得谁说的都对。只有少读书,才能确立一个学者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立场和观点。

至于“多看书”,则是要多探索,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多看书。具体来说,可以看看开头,看看结尾,看看感兴趣的章节。

所谓“滥翻书”,就是不要只关注自己研究领域的那些书籍,而是要广泛涉猎,不论是历史、政治、哲学、美学,哪怕是一些趣闻轶事,也可以多翻一翻。这既是一种闲暇时间的娱乐,也能拓展视野,让自己的学问永远不脱离所生活的时代,永远与自己走过的那段历史贴合在一起。

如今,我已经毕业多年,并追随恩师的脚步走进高校,躬耕讲台。但在我刚刚攻读研究生时与恩师的这两次谈话,对我影响至今。尽管老师没有当面告诉我“少读书”,没有当面指导我如何“通过导师学习大师”,但他的话语和为人学引导我确立了日后做学术研究、思考问题、看待问题的基本框架和方法途径,也希望青年学子能从中获得启示,学会学习,学会读书。(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你得换换脑壳了』

